



高校社科文库
University Social Science Series

教育部高等学校社会科学
发展研究中心资助出版

《礼记》语言学与文化学阐释

Linguistic and Cultural Study
on *The Book of Rites*

杨雅丽 © 著

 人民出版社



高校社科文库
University Social Science Series

教育部高等学校社会科学
发展研究中心资助出版

《礼记》语言学与文化学阐释

杨雅丽 © 著

 人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礼记》语言学与文化学阐释 / 杨雅丽著. —北京: 人民出版社, 2011
(高校社科文库)

ISBN 978-7-01-009862-3

I. ①礼… II. ①杨… III. ①礼仪—中国—古代②礼记—语言文化学—研究 IV. ①K892.9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1)第 074981 号

《礼记》语言学与文化学阐释

LIJI YUYANXUE YU WENHUAXUE CHANSHI

杨雅丽 著

策划编辑: 刘智宏

责任编辑: 张旭

封面设计: 阳洪燕

出版发行: 人民出版社

地址: 北京市朝阳门内大街 166 号

邮编: 100706

邮购电话: (010)65250042/65289539

印刷: 北京京都六环印刷厂

经销: 新华书店

版次: 2011 年 6 月第 1 版 2011 年 6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开本: 730 毫米 × 970 毫米 1/16

印张: 19.75

字数: 308 千字

书号: ISBN 978-7-01-009862-3

定价: 39.80 元

著作权所有 侵权必究

执著探求 收获丰厚

——序杨雅丽著《〈礼记〉语言学与文化学阐释》

段国超

五四时期的文学大师周作人是写序的高手，他在 20 世纪上半叶约二十余年的时间里，曾为人为己写了不下 200 篇序。关于如何写序，他曾说过这样的话：“做序是批评的工作，他须得切要地抓住了这书和人的特点，在不过分的夸扬里明显地表现出来，这才算是成功。”（《〈燕知草〉跋》）

但过去我对他的这段话不以为然。写序诚然是“批评的工作”，但为何就一定要两样都“抓住”？我以为写序是相当自由的，“这书和人的特点”只要抓住一样就可以了。写出了“书”的特点就不一定要写出“人”的特点，写出了“人”的特点就不一定要写出“书”的特点，甚至“这书和人的特点”都不写也可以！君不见如今这社会上写序的人何其多，而这序不都是五花八门的吗？有几个就那么认真，既写书的特点又写人的特点？有的人甚至在“书”未读“人”未识的情况下就写呢！今天我读过《〈礼记〉语言学与文化学阐释》这本书后，再联想它的著述者杨雅丽教授本人，我觉得写序真的需要像周作人所说的，“须得切要地抓住了这书和人的特点”。不然，这序就不算合格，就不能算“成功”。现在，雅丽同志嘱我给她的这本著作写序，我虽无才，也想尝试着这样做，努力地学习这样做。

雅丽同志十几年前,曾参加陕西师范大学辞书编纂研究所主持的《十三经辞典》《礼记》卷的编写,在词条编写中,认真研读《礼记》,参阅东汉郑玄的注、唐代孔颖达的疏,以及元人陈澧、清人孙希旦等训诂学家的注释,这使她不仅对《礼记》的基本内容有了比较准确、充分的理解,具备了研究《礼记》的前提条件,也使她自此对《礼记》产生了浓厚的兴趣,与《礼记》结下不解之缘。

辞典编写工作结束后,雅丽同志在一些学术刊物上发表了《礼记》词语训诂与文化阐释方面的论文,如“桃茢”考辨》、《论〈礼记〉丧祭之礼的人文意蕴》、《从先秦儒学看华夏祖先的自然生态忧患意识及其现实意义》等,并于2002年于三秦出版社出版了专著《礼记研究》,这是她研究《礼记》的第一部学术著作。如果说此前学术界研究《礼记》的成果主要是“注”、“疏”和“今注”、“今译”,那么《礼记研究》则是对《礼记》进行整体性、宏观性、专题性研究的著述。《礼记研究》从某种意义和某些角度来说,在《礼记》研究领域具有填补空白之意义。《孔子研究》、《陕西社会科学》等学术刊物发表评论文章,认为该著是“礼学研究的重要收获”。应该说,它在学术界,特别是国学界,已经产生了相当大的影响。

我原以为,《礼记研究》出版后,雅丽同志对《礼记》的研究也许就画上了一个句号。因为《礼记研究》对《礼记》的挖掘已经够深入了,其成果已经非常丰厚了。就一个研究者来说,也许她已经将全部精力和心智用尽,在该领域可以向学术界交账了。但想不到的是,她并不满足于已有的成绩,而将研究《礼记》作为自己学术生涯中执著追求的长期目标,其精力、心智乃至兴趣有如刚开启闸门的水流,汹涌地流淌和奔泄下去。

《礼记研究》出版后,她继续在一些期刊上发表《礼记》研究方面的论文,仅我所读到的就有十几篇。作为教授,她在所在学校开设选修课程——《礼记研究》,在长江师范学院“钩深讲堂”就《礼记》研究举办系列学术讲座;作为学者,她还走出校门,以学术服务社会,给机关单位作解读《礼记》的学术讲座;作为

《礼记》研究专家,她在多次学术会议上,将研究《礼记》的成果进行广泛的学术交流。这些活动给我一个突出印象:雅丽同志把《礼记》作为一门学问来研究,是全力以赴的、不遗余力的、勇往直前的,她在《礼记》研究方面已成为一个很有影响的学者。如果把这些看作在学术场地跌、爬、滚、打的探索过程,那么,雅丽同志现在摆在我面前的这部即将出版的书稿——《〈礼记〉语言学与文化学阐释》,既是她长期学术实践的必然结晶,也是她多年来持之以恒、执著求索精神的见证,还是当今国学研究,特别是礼学研究的丰厚收获!

二

《〈礼记〉语言学与文化学阐释》是雅丽同志潜心研究《礼记》的第二部专著。她在给我的来信中写道:

我写作这本书的目的与写作《礼记研究》一样。第一,阐发《礼记》的学术思想和文化精神,特别是那些对当代社会有借鉴和指导意义的学术思想。第二,拓宽学术视野,探讨《礼记》、礼学与传统文化中有研究价值的理论问题,特别是在前人尚未注意,或已经注意而未深入研究的一些领域提出自己的看法。我的指导思想是,在研究过程中要坚持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唯物主义,坚持实事求是和古为今用的原则。

《礼记研究》是我参加《十三经辞典》编写时研读《礼记》,不断思考的体会与感悟,其内容是对《礼记》的文化阐释、词语训诂及其语言艺术成就的分析。该书完成后,我一直忐忑不安。自己才疏学浅,书中有太多不足,常觉愧对读者。所以我继续研读《礼记》,在家里读《十三经注疏》中的《礼记正义》与孙希旦的《礼记集解》,外出就带上陈澧的《礼记集说》阅读,想借助古注在原典阅读中有新感悟和新发现。这时我注意到,有些重要问题在《礼记研究》中已涉及,但未能深入研究,有些问题写《礼记研究》时没有想到。在《礼记研究》交付出版时,我就萌生了继续研究《礼记》的想法,一方面打算继续探讨一些

礼学的理论问题,一方面认为应该比较系统地研究《礼记》的语言。在阅读《礼记》时不断思考,将思考得比较清晰的观点、感悟先写成论文发表,或提交有关学术会议,或作为学术讲座的课题。同时继续深入思考与研究,详细论证与推理,形成比较系统的观点,写成书中的章节。

雅丽同志是治学严谨的学者,她研究《礼记》有明确的目的、指导思想和成书构想,并付诸实施。现在这部已经定稿的《〈礼记〉语言学与文化学阐释》,即是她严格地实践、执行、落实她的写作目的、指导思想和成书构想的丰硕学术成果。

三

那么,《〈礼记〉语言学与文化学阐释》又有哪些特点呢?

(一)超越自己——追求对《礼记研究》的超越

《〈礼记〉语言学与文化学阐释》与《礼记研究》都是雅丽同志研究《礼记》的专著。两部著作有相同之处,都是作者逐字逐句研读《礼记》的点滴心得的汇集,所涉及的领域的确有相似之处:其一,都研究《礼记》与礼学的文化意义;其二,都是对《礼记》进行整体性、宏观性、专题性研究的著述;其三,都有研究《礼记》语言的章节,此项研究都有填补“空白”之意义。

说到这里,我想请读者注意:这些“相似”只是研究对象和研究角度的相似。如果细看这两本书的目录,细读其中的内容,就会发现,这两部著作所写内容之间虽然有内在联系,但后者是在前者基础上对《礼记》更加深入细致的研究。可以这样说,《礼记研究》在该领域开辟了一条新路,而《〈礼记〉语言学与文化学阐释》是以《礼记研究》为起点,扩宽了研究的视阈,获得了比《礼记研究》更为丰硕的成果。在《礼记》语言研究方面,《礼记研究》是从无到有,可以说是以“0”为起点;而《〈礼记〉语言学与文化学阐释》则是以《礼记研究》为起点,对

《礼记》语言更深层次的研究。说得更简明、更准确一些,《礼记研究》和《〈礼记〉语言学与文化学阐释》,一个是初探,一个是再探,一个是起步,一个是接棒,二者是姊妹篇的关系。由于《〈礼记〉语言学与文化学阐释》是在《礼记研究》基础上对《礼记》更深入的研究,所以说,《〈礼记〉语言学与文化学阐释》的学术成就超越了《礼记研究》,标志着著作者学术思想的成熟和对自己的超越。

(二)“学”与“思”并重——在辛勤阅读与独立思考中追求超越

雅丽同志坚持读书与思考并重,坚信在“学”与“思”密切结合之时心灵深处就会迸发出思想的火花,《〈礼记〉语言学与文化学阐释》即是她在辛勤阅读与独立思考中凝聚的思想与智慧的结晶。

1. 经典研究从文本阅读出发,是雅丽同志研究《礼记》的基本方法。她反复研读古注,借鉴当代学者对《礼记》的注释与研究成果,力求准确把握文本语言的含义,直接获取学术信息,感悟先哲思想,并通过独立思考形成自己的观点。

2. 广泛阅读现当代学者研究历史、哲学、美学、宗教、伦理、文字训诂等的著述,为研究《礼记》置备一个广阔的学术空间,避免眼界之褊狭与思想之偏执;在汲取前人成果之同时,坚持独立思考,防止陷入人云亦云的误区。

雅丽同志注重文本阅读,以参阅古注为进入文本语境之津梁。值得注意的是,她还参阅了近百种现当代学术研究著述,我们只要看看她在本书的末尾所罗列的“主要参考文献”,就可以明了其中的底细。雅丽同志这样做,目的是掌握最新学术信息,做到知己知彼,既避免重复别人,又能出新,有自己的发现。说得更具体些,就是在精心阅读、准确理解《礼记》之同时,借鉴前人成果,进而达到这样几个目的:第一,如果这些著作对《礼记》根本没有涉及,就权当增进学识,磨砺自己的学术功力。第二,如果这些著作对《礼记》之整体或对《礼记》的某个方面有所研究,还研究得比较透彻,就不妨有所汲取,开启自己的思路;如果自己没有更新的发现,就不妨回避,不再重复。第三,如果这些著述对《礼记》的某个方面有所研究,但比较肤浅,甚而有错,而自己有兴趣,有想法,就不妨深入探究下去,纠错并提出新见,从而占据这个领域的制高点,等等。

从雅丽同志对《礼记》的研究,我们可以得到这样的启发:做学问,必须刻苦学习,增进知识,充实自己,有的放矢;不然就做不了真学问,甚而欺世盗名、自欺欺人。

3. 设置若干专题研究《礼记》的学术思想。该著对《礼记》学术思想的研究是通过设置专题进行的,如:

第一章:《礼记》学术思想的时代精神

第二章:“称”——礼学之精义

第三章:孔子鬼神观念在礼学中的两难境地

第六章:儒家乐论的伦理政治型特征——《礼记·乐记》解读

这种设置专题的方法有许多好处。《礼记》的内涵是一个整体,但却由方方面面构成。如将这方方面面摆列开来,一个专题一个专题地论述,既清楚,又醒目,笔力也容易集中。如该著第六章设专题研究儒家乐论的伦理政治型特征,有四目:

一、礼和乐在周代政治中的完美结合与儒家对“礼崩乐坏”的思考

二、“声音之道,与政通矣”,故察乐可以知政

三、乐、礼相异,乐具有“合和”人心之功能

四、乐“通伦理”,蕴涵了丰富的道德精神

本书第六章设专题从四个方面论证儒家乐论的精神内涵,这不是既清楚、醒目而又深入透彻吗?

4. 设若干专题研究《礼记》的语言,探索词语诠释的新途径。如:

第四章:“绘事后素”考辨——兼析“礼后乎”

第五章:“月令”语义溯源——《礼记·月令》解读

这两章对词语意义的考察与传统训诂方法不同,将词语放置于篇章与社会历史语境中去推求其“本真”之含义,揭示词语组合与话语叙述的深层文化意蕴,提出独立、新颖而又有说服力的见解,在研究方法上是对传统训诂学的突破。

该著的第八章至第十章研究《礼记》的词汇系统。这个领域除杨雅丽教授本人在《礼记研究》中有所涉及外,似乎无人触及。这三章对《礼记》词汇系统

的研究,也是通过设置专题进行的。

以上列举的章节展示了杨雅丽教授研究《礼记》的新视阈,也为我们提供了研究学问的新方法。

四

那么,《〈礼记〉语言学与文化学阐释》一书有哪些新颖而富有创意的学术观点呢?我想将它与《礼记研究》作对比分析。

(一)《〈礼记〉语言学与文化学阐释》的学术视野更加开阔

较之《礼记研究》,该著将《礼记》放置于更加广阔的时代背景下,审视它产生的意义,评价其学术思想,是对《礼记研究》的拓展与深化。

如第一章:《礼记》学术思想的时代精神,有四目:

一、《礼记》是儒家在“礼崩乐坏”时代反思重建政治秩序和价值观念的产物

二、以“仁”释礼——《礼记》与礼学承载的时代文化精神

三、《礼记》与礼学蕴涵的时代忧患意识

四、以礼仪实践构建富有时代特色的礼乐文化

著作者认为春秋战国至西汉初期是“诸子”时代之后期,是“人”的价值凸显、中国学术史上第一个无神论思潮到来之时。儒学的核心是“仁”,在此时代背景与文化思潮下,儒家对礼的阐释必然打上时代烙印,“仁”学成为儒家构建礼学体系的思想基础。儒家反对以侵占土地、掠夺财富与人民为目的的侵略战争;反对用活人殉葬,甚至反对用俑人殉葬;儒家认为礼不仅指行礼所用礼品,更重要的是行礼者内心的道德意识。儒家以“仁者,爱人”的道德情怀观照、阐释、评价礼之仪文与时人的礼仪实践,为古老的礼乐文化注入人文精神与生命活力。该章的内容是《礼记研究》所没有的,是对《礼记研究》的超越。

又如第二章:“称”——礼学之精义。《礼记》中屡屡出现“称”,训诂学家对

“称”有随文释义的解读,但不系统、不全面。该章设五目作专题式研究:

- 一、行礼的“资籍”须“称”其财
- 二、礼“称”其情
- 三、礼“称”身份
- 四、礼“称”自然天时
- 五、以“不称”之礼追求与道德精神“相称”之礼

该章写道:

(儒家论礼)多言及“称”,指所行之礼与行礼者所拥有的财富之多寡相称,与行礼者的身份地位、道德情感及其他方面相称、相符合。这是对“称”之思想的直接表述。但在更多的时候,儒家只是将“称”作为一种价值标准和文化诉求,隐含和贯穿于对礼仪规范和礼仪实践的记载、阐释与评价中。在儒家看来,符合“称”的原则,追求“称”的境界,本身就是一种最高范畴的“礼”。

该章第四目最有新意:

礼“称”自然天时,是中国古代农耕文化背景下华夏祖先独特的自然生态观念在礼文化中的呈现,也是儒家礼学最具有合理性的精神内核之一。这一思想在礼乐制度化、政治化的古代社会,对人们的礼仪行为具有积极的调适和制约作用,可以避免过分看重礼仪活动本身以及礼品的丰厚与奢华,而使礼仪走入庸俗、浅薄和极端化。人们在唯礼是尊的社会文化氛围中能够怀有“顺其自然”的文化心理,不必担忧在自然灾异到来时因为无法置办祭品而不能从事礼仪活动,也不必担心因为自然条件限制使礼品不够丰盛而遭遇鬼神的惩处。儒家礼学也因此而不仅具有肃穆、严谨,追求文饰之特征,而且具有质朴、自然,追求中庸与和谐的品质。

这是雅丽同志从《礼记》文本阅读中得出的观点,他人没有作过这样的论证,《礼记研究》也没有作过这样的论证。这是对前人的超越,也是对《礼记研究》的超越。

(二)对《礼记研究》已涉及,但未深入研究的问题作深入细致研究

如第三章:孔子鬼神观念在礼学中的两难境地,该章有三目:

- 一、从儒学的人文性与现实性看孔子的无神论倾向
- 二、从西周到春秋鬼神观念的巨变使孔子怀疑鬼神
- 三、孔子维护周礼因而不能旗帜鲜明地否定鬼神

著述者认为:《礼记》是原始儒家的礼学著述,儒家的鬼神观念决定着《礼记》如何阐释丧祭之礼,也决定着《礼记》的学术价值。孔子是具有鲜明无神论倾向的思想家,但因为丧祭之礼在现实生活中有重要的社会功能,所以孔子不能直率地表明自己不信鬼神,其鬼神观念在礼学中陷入“两难”境地,但处于“两难”中的孔子已站立于无神论立场。荀子是坚定的无神论者,他肯定丧祭之礼的社会作用,但认为祭鬼神只是一种“文饰”和政治手段,“礼的本质是治人”。儒家站立于无神论立场记载、阐释礼,考察时人关于礼的实践,所以《礼记》的礼学思想才能放射出无神论思想的光华,儒家礼学才能蕴涵如此丰富的人文精神。丧祭之礼与侍奉鬼神有关,任何人要研究礼,就必须关注人们的鬼神观念;要研究孔子、荀子礼学,就必须穷究其鬼神观念之内涵。《礼记研究》虽然涉及礼学代表人物孔子、荀子的鬼神观念,却未对其鬼神观念之内涵作出如此细致透彻的论断。《〈礼记〉语言学与文化学阐释》列出这样的专章就此问题作深入透彻的研究,这当然是在该领域开辟了更加广阔的学术视野。

(三)以独特方式阐释《礼记》与礼学文献的语言,取得丰硕的研究成果

如第四章:“绘事后素”考辨——兼析“礼后乎”,该章涉及礼学、《诗经》解读、训诂学、美学等领域,有三目:

- 一、对“绘事后素”与“礼后乎”的两种经学解读
- 二、从礼学视野解读“礼后乎”
- 三、从儒家的文质之辩解读“绘事后素”与“礼后乎”

该章对文献语言的考证不走文字训诂之一径。首先对著名经学家的训诂资料分析评判,辨其正误,提出并论证自己的观点;然后进入礼学领域与儒家文质之辩的视阈,将语句放置于更加广阔的历史文化语境中,充分论证自己的观点。对此问题以前没有人这样研究过,就是《礼记研究》也没有这样研究过。

如第五章:“月令”语义溯源——《礼记·月令》解读,有四目:

- 一、从《月令》程式性话语组合看“月令”语义的政治指向
- 二、从《月令》篇与《礼记》的关系看“月令”语义的政治指向
- 三、“月令”语义从政治范畴转向自然范畴,指每月的“气候和物候”
- 四、《礼记·月令》中“春令”“夏令”“秋令”“冬令”之解读

该章考察“月令”语义的初始构成和其含义的历史变迁,不是纯粹的文字训诂,而是对一个语言符号含义的历史文化溯源。该章写道:

“月令”体裁当萌芽于前文字时期,它伴随着远古人类在采集、狩猎与农耕生活中对自然现象观察、辨识和思考而产生,作为珍贵的口传知识指导先民的生活。当华夏民族进入文明时代,“月令”被少数掌握着书写权力,为统治者服务的人书写下来,其内容随着人类的发展而渐次丰富与完备,成为礼法经典和统治者治世的政治指南,是“王者”治理天下所依据的政治文献。

《礼记·月令》是“月令”体裁的代表,记载天子在一年各月不同的自然条件下所发布的政令。……在早期文本里,“月令”的语义为:天子“每月当发布的政令”。

……

……后来的“月令”文献在行文方式、内容组合和篇章布局的侧重点等方面都发生了重大变化,特别是发布政令的“王者”及朝廷臣吏等文化符号逐渐淡化和消退,“月令”文献不再专属于“王者”和王朝政治,“月令”体裁的内容逐渐民间化、世俗化。

“月令”叙述重点的转移酝酿着一个语义转化的契机。“令”表示“政令”的语义逐渐隐退和失落,人们对“月令”的本源义渐渐淡忘,更

加关注“月令”体裁对各月自然天象、物候的叙述。活跃在“月令”文本中的人物主体也不再是“王者”及朝廷官吏,而是如崔寔《四民月令》所言之士、农、工、商等。这样,作为语言符号,“月令”的含义由天子“每月当发布的政令”,逐渐转移而表示“每月的气候和物候”。

前人在这一领域没有投入这么多的关注,这也是该著超越前人的一个地方。

再如第七章:引经与稽古:《礼记》修辞选择的崇古意识,有三目:

- 一、《礼记》中的稽古修辞
- 二、《礼记》中的引经修辞
- 三、引经与稽古:《礼记》修辞选择的崇古意识

这是对《礼记》两种修辞现象的文化阐释,该章写道:

语言是民族心灵的印证,一个民族的历史经历、思维方式、价值观念以及思想情绪的种种细节,不仅散发于这个民族遣词造句的声息之间,而且隐含于民族语言的深层结构中。华夏民族重视历史、崇拜古代圣贤的历史观反映在人们的语言实践中,就形成了具有民族特质的修辞方式,因而引经修辞和稽古修辞成为春秋战国时期最时尚的修辞风尚。

“六经皆史”,中国人不仅重视对经典文献蕴涵的经学义理的阐发,而且将经学文献中记载的历史作为组织现实生活的依据和参照。……历史上的每个中国人,无论是学富五车的鸿儒还是目不识丁的平民,事实上他们的心灵都生活于历史与现实之间;在他们的心中都珍藏着无数个熟悉而亲切的历史“故事”,在他们的脑海里都铭记着许多圣贤语录。他们在话语叙述中如果援引经典名句或古代圣贤的正面教诲,即是“引经”修辞;如果将文献记载的人们熟知的史实(包括正面的和反面的)用作论据来证明自己的观点,即是“稽古”修辞。无论是“引经”还是“稽古”,人们思维逻辑的走向是一致的,在中华民族的精神世界里,始终洋溢着“初始之完美”的文化情结与浓厚的崇古意识。

很显然,以前没有人对《礼记》的修辞艺术从这种“文化”与“历史”的角度进行过这样的研究。

该著对《礼记》词汇系统的考察有三章:

第八章:《礼记》用词细致有别的话语方式及其文化缘由

第九章:《礼记》同义词研究

第十章:《礼记》同义复合词研究

第八章有四目:

一、区别细致的祭礼称谓

二、区别细致的关于“洗”的称谓

三、对其他用词细致有别现象的考察

四、《礼记》用词细致有别现象的历史文化缘由

第四目探讨《礼记》用词细致有别现象的历史文化缘由,有三点:(一)用不同称谓分辨事物之间细微差异的思维特征;(二)重“名”、“实”之辨,尚“质”求“真”的民族文化心理;(三)用词细致有别现象折射的民族文化传统。第三点写道:

语言表述方式与词汇组合的深层缘由是民族的历史文化,汉语书面语蕴涵着汉民族独特的思维方式与丰富深邃的文化精神。

上古时代人们对“老”这一概念的表述形成了一个意蕴丰富的词群。……这反映了古代人民对人类生命历程的哲学思考与终极关怀,折射了先民对人类处于迟暮之年的生命个体由衷地悲悯与呵护。关于“老”所形成的词群,正是中国古代宗法制度下人们对血缘亲情特别重视而萌生的尊老、养老的文化传统在汉语词汇系统打上的深刻烙印。

……

正是在这样的历史文化背景下,……汉语的词汇系统必然需要为“老”这一语义创造一个内涵丰富的词群,人们需要为处于不同年龄段的老人命名来以示区别,这种区别既是语言表达的需要,也是实施社会政治措施的需要。

所以说,用词细致有别作为古代汉语词汇表达的特点之一,既有
人类思维认知的逻辑原因,也有社会历史文化的原因。

你看,著述者在这里探讨《礼记》用词细致有别现象的历史文化缘由,是多
么新颖、精辟!以前没有人从这种“文化”与“历史”的视角对《礼记》词汇系统
的特点作这样的分析研究!著述者以前的《礼记研究》也未来得及进行这样透
彻的分析和作出如此令人耳目一新的论断!

这本《〈礼记〉语言学与文化学阐释》不因袭前人旧说,处处都是著述者思
索、开掘的成果,所以处处说新话,处处出新见!这是近年来国学研究领域不多
见的现象。

五

《礼记研究》是“礼学研究的重要收获”,《〈礼记〉语言学与文化学阐释》是
著作者在《礼记》研究领域执著探求而获得的丰硕成果。

但这部著作也有美中不足,这里提出几点与杨雅丽教授和广大读者商榷。

(一)《礼记》是一部传世文献,几千年的历史传承中已有种种讹误。随着
考古的进展,新出土的《礼记》资料成为“《礼记》学”珍贵的研究借鉴。如湖北
郭店楚简《性自命出》篇等已证明《礼记》为先秦典籍,很多学者开始重新考察
其中大量关于孔子言行的记载。有学者认为在《礼记》一书中,“夫子曰”、“子
曰”、“子云”、“子之言曰”、“子言之”等,都是记载孔子之言,这里的“子”都指
孔子。出土文献还使历史上已定为“伪书”的《孔子家语》、《孔子丛》的部分材
料有了可靠的文献依据。但由于条件的局限,著作者未能借鉴这些出土文献,
是一种缺憾。

(二)礼不仅是经典文化、庙堂文化,而且是一种深入到中国社会一切领域,
甚至是民间的文化,在民间以“风俗”、“礼俗”形式存在。所以礼学研究应该深
入到民间,通过“田野”考察开辟新领域,寻找新的研究方法。专门研究“风
俗”、“礼俗”的学者将“田野”调查与礼学文献结合不够,研究礼学文献的学者
忽略了礼学研究应该与“田野”调查相结合与相互发证。本著的作者杨雅丽教

授似乎属于后者。从这一情况出发,我有这样的建议:本著在再版时似乎可以补做这样的工作,或者干脆再写一部将礼学与“田野”考察相结合,让普通读者能读懂的更为通俗的礼学研究著作。

(三)《礼记》可研究的问题很多,雅丽同志已对不少专题进行了研究。我以为这些研究都是相当透辟的,也是开创性的,很有理论深度的。我认为这部著作的第一章至第八章是写得相当精彩的,我想其他读者读到这里,也会有与我相同的感觉。第九章至第十章是否就写得不精彩呢?不是的!这几章设专题研究《礼记》的词汇系统,在该领域是拓荒性的研究。我只是认为词汇研究有相对的独立性,希望雅丽同志在这部著作的基础上写作一部《礼记》专书词汇研究的论著,将这一领域的研究深入下去,作出更大的贡献。

《礼记》是一个宝藏,它包容了中国上古文化的方方面面,有古典文化“百科全书”的价值。就我的了解,雅丽同志还将继续研究《礼记》。她已经为《礼记》研究作出了杰出贡献,她还年轻,又有厚实的学术功底,我们寄予她厚望,相信她今后的研究会取得更大成就!

杨雅丽教授嘱我为该著写序。惜我年迈体弱,加之天气炎热,未能细读、精研该著。拉拉杂杂地写出上面这些文字,未必得当,敬请杨雅丽教授和读者原谅!

是为序!

2010年7月1日于陕西鄂牛村草